

# 中国的称谓始于西周 周人何以史诗级逆袭



(资料图片)

公元前1059年5月下旬,岐山脚下的人们仰头看到了“赤乌降临”。那一天,水、金、火、木、土五行星聚集在西北的一小片天空中。这是种罕见的天象,3000多年后,天文学家追踪证实了那一年的“异象”,这种天象516年才发生一次。

看到异象的人是周族的人,姓姬,生活在岐山下的岐邑。百年前,他们的首领古公亶父带领族人踏上征途,来此定居,建立了属于自己族人的城邦。他们现在的首领叫姬昌,是古公亶父的孙子。

经历三代首领的经营,周人将岐邑建设得越发强盛,人口稳步提升。当时最强大的政权是位于今天中原殷墟的商朝,周人则偏居在遥远的西部,有山河阻隔,商人称他们为西岐。周人臣服于商朝,出土的甲骨文显示周人祭祀的时候,还会祭奠商人祖先和最近死去的商王。不过,商朝的纣王非常残暴昏庸,沉溺于酒池肉林,不理朝政,百姓民不聊生。

这次天象震撼了周人。他们隐隐觉得,这是不是一种神秘力量的召唤?或许是天命降临?

姬昌随即称王,宣布脱离商朝统治。在“天命”的召唤下,周人开启了征战之路,统治区域不断扩张。文王去世后,公元前1046年,其子周武王率领西土部落联盟东征,冬天时抵达洛阳北部的黄河边,跨过黄河,直扑商都。公元前1046年2月,西岐远征军在商郊牧野与商人全面交战。战斗异常惨烈,持续了一天一夜,次日日出时,周人大获全胜。商纣王自焚身亡,西周建立。

陕西临潼1976年出土的武王征商簋(又名利簋)铭文记载了牧野之战:“武王征商,唯甲子朝,岁鼎,克昏夙有商,辛未,王在阑师,赐有(右)事(史)利金,用作檀公室尊彝。”寥寥4行33字,惊心动魄。这只簋与《封神演义》的故事存在于同一时期,如今在国家博物馆可以见到真身。

今天,在关中平原西部的陕西宝鸡,岐山的地名,数千年未变。岐作为地名,在这里随处可见。在历史上,“岐”这个字与周朝密切相关,这里的周原遗址,散布着周人的大量遗迹。

与以残暴著称的商朝相比,周朝仿佛进入另一个文明的次元。几百年后,东周鲁国的孔子念念不忘的那个礼乐昌明、政通人和的时代,正是以文王、周公代表的先周晚期和西周早、中期。在后世,“周制”留下一个令人怀想的政体模式。周人更加娴熟地使用起语言和文字,系统地撰写历史、以诗言志,他们留下的故事和诗歌,至今仍不难读解。及至东周,诸子百家的哲学思想如熔岩喷发,达到令人困惑的高度。而这一切的一切,距离杀人献祭、神秘荒蛮的商朝,不过一步之遥。

西周肇建并不是中国历史上一次普通的改朝换代,而是一次文化上的跃升。从商到周,政治、哲学、文化等各层面改天换地。如历史学家许倬云

所说,周代的建立并不只是常见的朝代递嬗,也是整个文化体系与政治秩序的重新组合,从此奠定了中国文化系统的一些基本特色。他总结:“西周以蕞尔小国取代商,崛起渭上,开八百年基业,肇华夏意识端倪,创华夏文化本体,成华夏社会基石。”

谜团重重的商周巨变是如何发生的?

## 史诗级逆袭

这段遥远而缥缈的历史,在考古工作者的努力下,今天并非遥不可及。

2020年到2021年,在陕西宝鸡岐山县的王家嘴村西北,周原考古队发现了一座夯土建筑的基址。基址坐北朝南,面积超过2200平方米,是前堂后室的两进四合院式建筑。通过地层学、器物学分析后,考古工作者得出结论:这可能是周原遗址目前可以确认的第一座先周时期大型夯土建筑基址。

先周,指的是周人在武王灭商、建立西周王朝之前的历史时期,从古公亶父到周文王都属于先周。也就是说,先周是周人发迹的时期,周原遗址很有可能就是岐邑。

为了这个“先周首个”,考古工作者已经陆续奋斗了大半个世纪。

寻找先周,始于上世纪30年代的宝鸡斗鸡台,兴盛于周原。周原位于今天陕西关中西部,考古学界定义的周原有广、狭之别。狭义的周原指今天扶风、岐山两县的北部,东西宽约6公里,南北长约5公里。广义的周原则指关中平原西部,渭河之北、岐山以南的狭长区域,东西绵延70余公里,南北宽约20余公里,土厚水沛,自古就是理想的栖居之地。

2003年12月,考古队在周原遗址以西30公里的岐山周公庙遗址作野外调查时,在一个废弃的水渠里,北京大学考古专家徐天进偶然看见了一个小骨片,用手一擦,赫然有字。次年春天,考古人员顺藤摸瓜,在水渠边找到了一个埋藏着密密麻麻甲骨的坑,挖出来的第一片卜甲上,开头两个字就是“周公”。周公庙甲骨上一共辨认出400多个字,出镜率最高的名字就是周公。随后在一片野枣树林里,考古队又发现了22座大墓,其中10座有4条墓道,4座有3条墓道,而西周诸侯国国君的墓葬只有一或两条墓道。这些更高规格的墓葬主人不禁引人猜测:会是周王吗?但学者的普遍观点是,周公庙遗址应该是周公的采邑——即国君赐给卿大夫世禄的田地,那些大墓不是周天子的墓,而是周公家族的墓。

寻找岐邑仍在继续。2004年,考古人员在周公庙遗址以西10公里的凤翔县水沟遗址有了

新发现,发现了周长4000余米的城墙,是目前所知西周最大的城,城内也有大型宫殿基址。随后,他们以周公庙为中心,四处出击,在蒋家庙又发现一座军事防御性质的周城,在周公庙之西发现了铸铜作坊……

周文王在岐邑称王后,十年内似乎征服了居住在渭河流域的大部分商人族群,建立起周人的区域性霸权。他们逐渐东进,进攻了晋南的一些小国,距离商朝都城已经不远。文王去世前不久,在关中平原的中心位置建立“丰”作为新的都城,将势力从渭水西部的周原悄然东移。

文王去世后,其子姬发继承商大业成为武王,为父守丧三年后,武王率西土武装东征,完成灭商的最后一击。据《史记》的说法,商纣王聚集起70万军队迎战,武王的武装只有四五万人,但在牧野的凛冬时节,商人都无心为暴虐的纣王作战,纷纷倒戈,商王朝葬送于周人远征军之手。在后来与此有关的神话小说《封神演义》中,杨戩、哪吒、雷震子等人物都位列西土军队之中。

在商朝,周只是一个偏居西部边陲的少数民族聚落,在政治、经济、文化、军事等各方面,与中央王权都没有可比性。这样一个小国,为何产生灭商的理想,又如何实现翦商大业,令人好奇。这是西周历史研究中的一个重要命题。历史学家许倬云是西周史专家,著有《西周史》,他研究的重点,就是西周从一个蕞尔部落,如何发展成为一个国家,而且建构了超越国家的封建秩序。

而正是这套秩序,无意间铸成了华夏社会的基石。

## 殷鉴不远:周的反思

不仅后世为周人灭商的历史所不解,连周人也很意外。

为什么周能灭掉商?周人何以配得上这天下?他们希望找到一种解释,同时也是在建立一种正统性。《尚书》中几篇写于周初的文献里,记载了灭商之初周人对这段历史的求索和解释。他们最后相信,是“天命靡常,惟德是亲”的道理让他们继承大统,将商人失国归咎于德行败坏,罪名包括酗酒、荒淫、不恤民力……《诗经·大雅·荡》记下了振聋发聩的名句:“殷鉴不远,在夏后之世!”周人发现,商朝的倾覆与夏朝近乎于原样复刻,他们终于领悟,这

便是“天命”的规律。

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特聘教授王震中曾经总结,商周两代礼制思维分别是注重“人神关系之礼”和“人际关系之礼”,从周初开始,周人——特别是周公——将对天的虔敬纳入礼制框架,提出敬天保民的理念,将“人神之礼”改造为“人际之礼”。王震中认为,实现这一改造最重要的途径,就是引入“德”的理念和规范,形成天命与德治、天命与民意相结合的辩证统一。相较于商代的神权政治,这显然是一个飞跃性的进步。

周人将敬天保民的思想贯彻在执政中,比如“明德慎罚”“知稼穡之艰难”“知小民之依(痛)”等,与商朝的人祭传统等相比,周人在尊重生命、体恤生民方面走出了重要一步。许倬云认为,周人提出的“天命”观念,可以引申为两点:第一,统治者的治国必须符合一定的道德标准;第二,超越的力量,亦即上天,对于人间秩序有监督与裁判的权力。这些观点是中国历史上前所未见的突破,摆脱了宗神与族神的局限,转化为具有普世意义的超越力量。统治者承受天命,就要负起天命赋予的道德责任。

“这是高超的理想,很难在真实的人生完全实现,但正由于有此理想,人间秩序的境界得以提升。”在《西周史》中,许倬云称赞道,“周人悬此理想,可谓中国文化上划时代的大事,不像别处以神意喜怒为标准的文化,要经过长时间的演变才走到这一步。”这一套新哲学,安定了当时的政治秩序,引导了有周一代的政治行为,也开启了中国人道精神及道德主义的政治传统。

## 奠基华夏文明

回到1976年凤雏村发现的那座甲组建筑基址,建筑里最神秘的部分,就是那个作为甲骨坑的窖穴。

这个长方形窖穴位于西厢房第二个房间里,长1.55米、宽1米、深1.9米,上段四壁为1.3米的夯土,属于房屋的夯土台基,下段为0.6米的生土。这个构造说明窖穴打破了房屋台基,时代应晚于房屋台基的年代。窖内东西两边还各有一个纵深1米左右的横向洞室,北边有一个小龕。

提到甲骨文,人们想到的几乎只有殷墟,其实周人也有用甲骨的习俗。其材质特点和字体风格,与安阳甲骨都有很大区别。许多刻字小如粟米,细如发丝,最小的只有1毫米见方,堪比微雕,用放大镜才能看清。而直笔刀法刚劲有力,圆笔运用自如,有独特笔风。

因为文字在社会中的广泛应用,可以推想,读写能力在西周得到了更大范围的普及,这

为文化的发展奠定了基础。《易经》《尚书》和《诗经》部分内容便是由西周的人书写,中国真正的书写传统从此起步。周朝贵族从渭河平原向偏远地区迁移,可能同时带着那些受过良好教育的商朝遗民,文字和文化被播撒到更为广阔的地区,西周因此成为中国乃至东亚文字书写发展的一个关键时期。

“西周的文化对后世影响很大。比如礼乐文化,我们后来认为华夏与戎狄之分就是礼乐文化之分,何为华夏?礼乐文化就是华夏文化的核心。再比如政治的影响,周制与秦制成为塑造后世的两种政治模式。诸子百家更不用说了,中国文化的内核和基础都在于此,儒家就是以周公作为奠基人的。《诗经》更不用说了,奠定了文学的基础。所以我们经常讲,周文化某种意义上奠定了中国文化的核心。”中国社科院考古所研究员徐良高说。

商文化的显著特征是消灭与取代,周文化则以联盟和兼容为特征。“总的感觉,商文化的传播犹如肯德基快餐连锁店,全球一个标准。而周文化的传播犹如中国的川菜菜系,在不同地方都有所变化,以适应各地人们的传统口味偏好。”徐良高说。

从考古学视角来看,西周国家的形成可以视为一个渭河流域以外的那些带有强烈本地传统的各个地区植入周人精英文化元素的过程。自西周中期以来,周文化传统和不同地方传统的最终融合,为东周繁荣的地方文化奠定了基础。

1963年,在距离周原遗址不远的宝鸡市陈仓区贾村,考古人员从地底发掘出了一只西周青铜尊,名为何尊。何尊高38.8厘米,口径28.8厘米,外表张扬繁复,十分精致。尊内底部铸有122字长篇铭文,这篇重要的文献讲述了周成王迁都洛阳成周之事,最引人瞩目的,则是铭文中出现的四个字——宅兹中国。

这四个字的意思是,武王克商之后,向天昭告要建都于天下之中,治理民众。“宅兹中国”象征获得天命,拥有天下。所谓“中国”,并非指代国家,而是指代天下之中的区域。然而因为其字面含义,它被赋予了不可替代的意义:这是现存所有文字中最早的“中国”二字。

从文献来看,中国的称谓,正是始于西周。当然,彼时的中国与今天的中国,是两个完全不同的概念。然而隔着历史回看,那个遥远又苍茫、神秘又壮阔的远古时代,在骨子里与我们仍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它以崇德和平等的信条联合盟友,开创波澜壮阔的逆袭神话,又以接纳和包容的姿态融合异邦,走出不可思议的文化跃迁之路。如此种种,对三千年后的世界仍旧不无启迪。

倪伟(摘自《中国新闻周刊》)

